

「兩湖事變」中蔣介石態度之探討 (1929)

陳進金

摘要

1929年的兩湖事變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全國後，首次地方軍人的異動，對南京中央的統治威信影響至鉅，該如何妥善解決來自地方的挑戰與紛爭，考驗著中央領導人蔣介石的智慧。兩湖事變發生時，蔣氏即強調以政治手段解決，不輕啓戰端。蔣介石除了致力於和平解決的嘗試，同時也進行著備戰的部署，以蔣氏對地方軍人的瞭解，「有備無患」有時反而可以止戰。值得注意的是，蔣氏「和平解決的嘗試」與「孤立桂系的布署」幾乎同時進行，可以視為蔣氏的「兩手策略」，更可以說是一種「相輔相成」的策略運用，也就是說蔣積極於進行孤立桂系的戰略布署，有助於能夠達成和平解決爭端。

「國家統一」，一直是蔣介石的最高目標，因此當和平方式無法解決紛爭時，蔣氏為求國家統一，會不惜訴諸武力。兩湖事變在和平解決嘗試失敗後，蔣即斷然決定武力討伐；此時「孤立桂系的布署」，又成為武力討伐得以成功的最佳保證，蔣氏的戰略運用得當，終於獲得討桂戰事的勝利。不過，訴諸武力討伐來達成統一，不僅耗損國力，更常常召致外患入侵，使中國的領土和主權迭遭列強的欺凌與攫奪。因此，歷經1929年一整年內戰的蔣氏，於1930年初也曾一度希望實施聯邦制來解決爭端，應可視為蔣氏對於武力方式來達成國家統一的自我反省。

關鍵詞：兩湖事變、蔣介石、桂系

Exploring into Chiang Kai-shek's attitude toward the Incident of Hunan and Hupei(1929)

Chin-ching Chen *

Abstract

The Event of Hunan and Hupei in 1929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as a challeng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t Nanking, who had to maintain its authority to counterbalance local military powers. As the incident occurred, Chiang tried to isolate the military powers of Kwangsi by political measures on the one hand, and got prepared to turn to military measures in case of ne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wo-handed strategy proved to be successful in that one complemented the other in helping Chiang to settle the conflict peacefully.

To unify the nation had always been the ultimate goal for Chiang, and his strategy had always been to use peaceful means first and then military powers when necessary. This strategy had worked for Chiang in the Incident of Hunan and Hupei. However, in so doing, the nation was quickly weakened by the internal war and foreign aggression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engulf the nation. This is perhaps something Chiang regretted in his retrospect.

Key words: The Incident of Hunan and Hupei, Chiang Kai-shek, The Kwangsi Military Power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兩湖事變」中蔣介石態度之探討* (1929)

陳進金**

壹、前言

1928年12月東北易幟，中國達成形式上的統一，但國民政府仍然無法完全控制擁兵自重、割地自據的地方軍人。¹有鑑於此，爲了抑制地方軍人勢力的發展，使國家建設能步上軌道；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乃決心裁減軍隊，實施國軍編遣。翌（1929）年元旦，國民政府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召開國軍編遣會議，準備從事部隊縮編，卻引起地方軍人的猜疑，認爲政府藉以削弱其軍權，遂有一連串反抗中央的行動。²使北伐後形式一統的局面，維持不到半年，再啓內戰。

1929年1月，由蔣介石所主持的國軍編遣會議在南京正式召開，經六次大會後於1月25日舉行閉幕典禮；2月5日，國軍編遣委員會議舉行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正式展開各項工作。1929年2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即將召開，李宗仁深知蔣介石將裁撤各地「政治分會」³，

* 本文為執行國科會計畫之部分成果，計畫編號為：92-2411-H-259-011。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費心指正並提供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05年9月9日，通過刊登日期：2005年11月8日。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¹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4-16.

² 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詳），頁148-152；劉維開：《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8年3月），頁143-160。

³ 政治分會，全稱應為「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分會」。最早設立的政治分會為1926年12月之廣州分會；之後，全國各地陸續成立政治分會，分別有開封、太原、北

如此桂系在湖南定失憑藉；同時，李又接獲何鍵密報蔣運兩、三百萬子彈繞道江西，接濟湖南省主席魯滌平，整個形勢似乎對桂系不利。武漢政治分會乃於1929年2月19日，決議改組湖南省政府，撤換省主席魯滌平，以何鍵繼任；同時派第五十二師師長葉琪、第十五師師長夏威率兵由鄂入湘，進佔長沙，迫使魯氏遁走江西，是為「兩湖事變」。

兩湖事變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全國後，首次地方軍人的異動，武漢政治分會以武力方式強行任免地方官，已違反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對政治分會權限的規定，也抵觸了編遣會議各部隊不得擅自調動的規定。此一事件，被視為桂系軍人對南京中央統治權威的挑釁。以往有關「兩湖事變」事件的研究，大都僅能依賴相關人物的回憶錄，因缺乏原始檔案資料的佐證，對於蔣介石或桂系軍人和戰的態度，欠缺較具體的探討。⁴在相關著作中，Daina Lary認為桂系發動兩湖事變，撤換魯滌平的主要目的，是要由桂系完全控制湖南，將兩湖及廣西，與李濟深控制的廣東聯成一片，再與當時白崇禧進駐的天津、唐山一帶，形成一個「廣西王國」。⁵陳存恭教授則認為新舊思潮的衝擊與政治文化的失調、黨政軍派系的分立與競爭、列強的介入等因素，影響北伐後中國的動亂。⁶劉維開教授則

平、西安、武漢等地，政治分會形同各地方實力派軍人的勢力範圍；1929年3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取消全國各地政治分會。參閱張憲文等主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8月），頁380-381。

⁴ 較重要的回憶錄如：白崇禧口述，賈廷詩等訪問記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5月）；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黃紹竑：《五十年回憶》，載張玉法、張瑞德主編：《中國現代自傳叢書》（臺北：龍文出版社，民國78年6月）。陳存恭教授曾分析指出蔣介石對桂系發動兩湖事變的態度，面臨和戰兩難的困局，其處理原則為「但能用政治手段解決亦不肯輕於用兵」。參閱陳存恭：〈李、馮、閻等亂事之平定〉，載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78年1月），第3篇，「統一與建設」（3），總頁1532-1533。

⁵ Dai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81-87、115-128；劉維開：《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頁144-145。

⁶ 陳存恭：〈李、馮、閻等亂事之平定〉，總頁1517-1522。

把兩湖事變視為實施國軍編遣會議的重大影響之一。⁷但對於蔣介石的態度，卻一直缺乏較具體的資料來加以說明。

自從國史館開放《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後，提供了直接觀察蔣介石態度的資料，中國大陸學者曾業英教授即運用《蔣檔》資料寫成〈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一文，從軍事學的角度分析蔣氏在這次戰役中謀略運用的成功。曾文認為：「蔣介石在1929年討桂戰爭爆發前始終堅持後發制人，為其武力討桂贏得了部分時間和人心。戰爭將發未發之際，他又極其周密地在調遣軍隊、整頓紀律、爭取友軍、瓦解敵軍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並在戰爭過程中靈活運用攻防結合的戰略戰術，取得了戰爭的最後勝利。」⁸曾文充分利用《蔣檔》函電資料，確實頗能掌握蔣介石處理兩湖事變的方針；但是過於強調軍事謀略，把蔣氏的一言一行均視為軍事謀略的算計，能否真正呈現蔣氏的內心想法？事變之初，蔣氏政治方式的嘗試，是為了後來軍事行動贏得人心，或是其確有和平解決之意？戰爭爆發之後，蔣氏的武力討伐，是為了殲滅桂系以「削藩」，或是另有目的？從和平嘗試到武力討伐，蔣氏如何詳細籌劃？其轉折與考量為何？上述問題均有待進一步討論。

貳、和平解決的嘗試

192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告國民書云：「先總理交與吾人統一全國之第一步工作，已於三年內完成。……今日國軍編遣會議開幕，對於軍費之確定預算與冗兵之切實遣散，均將解決。」⁹同一天，國軍編遣委員會正式開幕，蔣介石率全體委員宣誓就職，並通電全國，將力矯昔日軍閥

⁷ 劉維開：《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頁143-149。

⁸ 曾業英：〈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2期（2000年3月），頁1-39。

⁹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臺北：未對外刊行，民國67年10月），頁1，總頁259。

擁兵自衛占據地盤之惡習。¹⁰不過，蔣氏所提出的：「對於軍費之確定預算與冗兵之切實遣散，均將解決」、「力矯昔日軍閥擁兵自衛占據地盤之惡習」等目標非但無法兌現，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發生桂系軍人反抗中央的「兩湖事變」。

事實上，軍費預算確實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後的一大難題，所以宋子文才會在國軍編遣會議第三次大會上提出「確定軍費總額實行統一財政辦法提案」，即希望各軍事領袖瞭解政府財政上的困難，交出手中所控制的財政權，以達成財政統一。¹¹然而國民政府欲向地方軍人收回財政控制權，無異緣木求魚，地方軍人反而屢向中央要脅索取軍餉；蔣介石也承認自從1927年清黨後，同志的互信與共信基礎都還沒有恢復健全。¹²1928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後，蔣介石曾希望整合地方勢力，讓具有權力基礎的地方軍人，進入中央政府任職，例如任馮玉祥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閻錫山為內政部部長、李宗仁為軍事參議院院長、李濟深為參謀總長。¹³此一舉措，卻讓地方實力派人物認為是中央藉以架空地方領導人勢力的措施。因此，國軍編遣委員會閉幕後幾天內，李濟深、馮玉祥、閻錫山等急欲返回粵、陝、晉根據地，而蔣氏也只能喟嘆且無奈地答應他們。¹⁴李、馮、閻相繼離京，正代表著中央與地方的隔閡仍深，彼此互信基礎薄弱，是以難免因為些微的磨擦而引發更大的爭端。

1929年2月17日（即發生兩湖事變的前兩天），蔣介石於杭州對中國國民黨浙江省代表大會演講時，對於黨內的紛爭已有所感慨，並於當天致

¹⁰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頁1，總頁259。

¹¹ 宋子文：〈確定軍費總實行統一財政辦法提案〉，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24輯》，合訂本（臺北：編者，民國57年9月），頁30-50，總頁4868-4888。

¹² 袁惠常編：《民國18年之蔣介石先生》，「事略稿本」（民國18年2月4日），〈文物圖書〉，《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以下簡稱「事略稿本」）。

¹³ 許師慎編：《國民政府建制職名錄》（臺北：國史館，民國73年1月），頁119-126。

¹⁴ 「事略稿本」，民國18年1月28、29日。

電胡漢民表示將在杭州處理黨務糾紛。¹⁵兩湖事變發生後，李宗仁由南京潛赴上海，並發出通電表示：

頃據武漢政治分會電告，以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自受任以來，縱庇共匪，紊亂財政，違抗命令，近更舉動恣肆，無法制止。……及至前次遵照五中全會議決縮編軍隊，魯復違抗命令，屢有要挾，似此種種不法，自應加以撤懲。惟武漢政治分會有緊急處分，在事勢上固出於萬不得已，然不及候中央核准，遽令各師執行，未免跡近操切。宗仁忝為分會主席，雖因公應召來京，究屬咎無可辭。除懇鈞會鈞座顧念湖南人民痛苦，迅賜追認武漢政治分會第四十九次議決，照准施行外，並請將宗仁加以處分，以明責任。¹⁶

李宗仁此電雖云自請處分，實則將兩湖事變的責任歸諸於魯滌平的把持稅收、剿共不力和製造民怨等，甚至還要求南京中央追認武漢政治分會的行動。2月23日，蔣介石在奉化故鄉得知桂系軍人以武力攻湘，逼走魯滌平時，曾嘆曰：「桂系跋扈恣睢，目無中央，從此恐又多事矣！」¹⁷蔣氏一語成讖，不幸而言中，往後幾年中國政治局勢的發展，正如蔣所憂慮的「多事矣！」

原本要在奉化停留兩週的蔣氏，爲了處理兩湖事變只得兼程返回南京，24日偕同行政院長譚延闓赴上海與李宗仁會商解決辦法，希望李氏能與中央態度一致，李答應了蔣的要求，同意負責制止武漢行動。¹⁸爲此，2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¹⁹決議：特派蔡元培、李濟深、李

¹⁵ 「事略稿本」，民國18年2月17日。

¹⁶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6卷第8期（民國18年2月22日至2月28日），總頁1800。

¹⁷ 「事略稿本」，民國18年2月23日。

¹⁸ 曾業英：〈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2期（2000年3月），頁7；「事略稿本」，民國18年2月25日。

¹⁹ 訓政時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中國國民黨的常設最高機構，國民政府為政府的最高機構，居間聯繫的機構為政治委員會，亦稱政治會議。參閱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臺北：東華書局，民國77年9月），頁193-194。

宗仁和何應欽四人，分就軍事和行政部分切實查明以憑核辦。²⁰此時，蔣、李若能開誠布公，針對問題癥結商議解決之道，或能讓爭端消弭於無形，奈何雙方互信基礎不足，最後就只能兵戎相見。

兩湖事變剛發生時，南京要員譚延闓、胡漢民等人，均認為此一事變係驕兵悍將違抗命令的軍閥行爲，力主討伐。²¹蔣氏也認為此一事件，對剛完成北伐，統一全國的南京中央之統治威信影響至鉅，但他還是希望以政治方式解決，宣稱：「中央對此事但能用政治手段解決，亦不肯輕於用兵，如不能就範自當出於一戰。」²²是以，期盼藉由四人小組的調查，以弭爭端。

兩湖事變能否以和平方式解決，桂系軍人的態度也是重要的關鍵，根據曾業英〈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一文指出：「桂系上下一致認為蔣介石毫無和平誠意，決心武力對抗到底。」²³陳訓正於《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一書中則記載云：「三月中旬，李宗仁、李濟深方在上海，白崇禧在北平，與武漢兩粵各處均互通消息，討論備戰，白崇禧主戰最力。」²⁴似乎認為白崇禧是桂系主戰派的代表。事實上，事變初起，白崇禧絕不是主戰派的代表，甚至還曾試圖勸告李宗仁等人接受南京的條件。3月4日，李宗仁針對南京中央所提出的條件致電徵詢白崇禧意見云：「昨何敬之、葛敬恩囑張華輔、陳儀轉來蔣命提出條件：一、改組兩湖政府；二、漢政分會及集團軍總部自動呈請提出取消；三、兩湖各軍均回原防。其意若不能完全遵照辦理，寧以武力解決。弟已婉言答覆，請

²⁰ 「事略稿本」，民國18年2月27日；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6卷第8期（民國18年2月22日至2月28日），總頁1800-1801。

²¹ 白崇禧口述，賈廷詩等訪問記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下冊，頁933。

²² 「賈景德等致閻錫山歌亥電」（民國18年3月5日），〈兩湖事變案〉，《閻錫山檔案》（以下簡稱「《閻檔》」），國史館藏，檔號：0372.42/1037.2-1-2，微捲第4捲。

²³ 曾業英：〈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2期（2000年3月），頁8。

²⁴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第2輯，第1卷（臺北：出版者不詳，民國41年），頁16。

容討論。」²⁵

翌日（3月5日），白崇禧覆電李宗仁表示：

昨奉鈞座支申電，對介公所提條件，禧頃與鶴齡、元戎、澤民諸兄商議，咸稱此次我方政略戰略均處於不利地位，不如暫時忍恥接收（受）其條件，然後將北方各師以編遣為名，調回武漢，整理兩湖。第一條件則不成為重要問題，概可承認。至於第四改組兩湖省政府，應須得我方同意，亦無不可。請迅速表示，以免夜長夢多，否則一旦決裂，我方兵力南北分離，未必能操勝算，未知鈞意若何。乞酌裁賜復。²⁶

同一天，白崇禧亦致電北平李品仙、廣州黃紹雄、漢口胡宗鐸、夏威夷等人主張：「以忍讓徐圖挽救。」並告誡夏、胡二人如蔡元培、何應欽抵漢口，須極力斡旋，以不用兵力挽回危局為幸。²⁷同一天（3月5日）白氏又連續致電胡宗鐸、夏威夷、陶鈞、潘宜之等云：

一、介公所提各條件應早委婉磋商，分別承認。二、集團總部提前取消當無問題，軍隊調回兩湖防地亦可遵辦；兩湖省政府若照現在組織政分會，似不要亦可，請其以明令頒佈即遵行，以被動地位取消為妥，惟省政府取消似應力爭。三、此次風潮因挑撥者多，恐難避免，我若能萬分忍讓，預料三代大會必有風波，因馬二決不甘居人下也。惟諸公對浦口、南京、蕪湖、安慶、九江各處，請多派員探聽軍事行動。²⁸

白崇禧此封電文中的「馬二」，係指第二集團軍的馮玉祥；白氏判

²⁵ 「李宗仁致白崇禧支申二電」（民國18年3月4日），〈雜派民國18年3月往來電文錄存〉，《閩檔》，檔號：18.0372.42/0032-3，微捲第43捲。

²⁶ 「白崇禧致李宗仁微酉申」（民國18年3月5日），〈雜派民國18年3月往來電文錄存〉，《閩檔》，檔號：18.0372.42/0032-3，微捲第43捲。

²⁷ 「白崇禧廖磊致李品仙黃紹雄夏威夷胡宗鐸微戌電」（民國18年3月5日），〈雜派民國18年3月往來電文錄存〉，《閩檔》，檔號：18.0372.42/0032-3，微捲第43捲。

²⁸ 「白崇禧致胡宗鐸夏威夷陶鈞潘宜之歌晨二電」（民國18年3月5日），〈雜派民國18年3月往來電文錄存〉，《閩檔》，檔號：18.0372.42/0032-3，微捲第43捲。

斷於國民黨三全大會上，南京中央與馮玉祥將爆發衝突，那時才是桂系的契機，目前不妨妥協接受蔣的條件。事實上，白氏的觀察頗具見地，馮玉祥對中央處理兩湖事變的態度確實有所不滿。基於此，白崇禧才主張暫時委曲求全，待機再起。此外，白崇禧雖主張暫時退讓，同時也積極爭取李濟深等人的支持，他於3月5日致電李濟深、黃紹雄表示：「此次風波極大，若能忍讓避免，固黨國之福，萬一人不諒解，相逼太甚，應如何應付，粵漢唇齒相依，湘鄂有失，粵桂難守。萬望兩公早示漢方機宜，以便遵守，利害相關，存亡與共，請勿忽視也。」²⁹是以，曾業英一文所云：白崇禧態度堅決，毫無議和之意。似與事實不若符合。

在這段期間，蔣介石與白崇禧的文電往返從不間斷；3月4日，白崇禧曾致電蔣氏云：「湘亂發生，謠言蜂起，誠恐有人乘機播弄，動搖大局，藉收漁利。職身在病中，心憂黨國，鈞座主持中樞，懇請設法穩定大局，兩湖必能聽命中央也。」³⁰3月6日，蔣氏覆電表示：「京滬謠誑頻興，乃由武漢扣留輪船與調動隊伍而來，中意亦恐有人造謠投機，故擬囑伯璇（張定璠）來平，面商解決大局之方。」³¹白崇禧接獲蔣氏此封〈魚電〉時，立即回電表示：歡迎張定璠來北平面商。另外亦電囑夏威、胡宗鐸，採取冷靜態度，聽候解決。同時把一切情形電告人在上海的李宗仁，並請李氏速致電夏、胡二人，設法制止他們的妄動。³²翌日（3月7日）蔣介石又再度電告白崇禧：「決不為人搖動，請勿遠慮。」³³同一天，蔣介石也致函李宗仁表示：「中央為防範計，且為威信計，不能不調使軍隊，

²⁹ 「白崇禧致李濟深黃紹雄歌已電」（民國18年3月5日），〈雜派民國18年3月往來電文錄存〉，《閩檔》，檔號：18.0372.42/0032-3，微捲第43捲。

³⁰ 「白崇禧致蔣中正支電」（民國18年3月4日），〈雜派民國18年3月往來電文錄存〉，《閩檔》，檔號：18.0372.42/0032-3，微捲第43捲。

³¹ 「白崇禧致李宗仁魚電」（民國18年3月6日），〈雜派民國18年3月往來電文錄存〉，《閩檔》，檔號：18.0372.42/0032-3，微捲第43捲。

³² 「白崇禧致蔣中正支電」（民國18年3月4日），〈雜派民國18年3月往來電文錄存〉，《閩檔》，檔號：18.0372.42/0032-3，微捲第43捲。

³³ 「蔣中正致白崇禧轉李品先陽電」（民國18年3月7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11，《蔣檔》；「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7日。

作正當之護民。……中央爲國家人民計，爲實現主義計，決不願輕啓戰端，只要於威信不失，則軍事無不可從長計議。」³⁴足見蔣氏希望透過與李、白二氏的文電往返來解決紛爭，不使歧見擴大而釀成武力衝突。

蔣介石與白、李二人電文往返，試圖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兩湖事變，但桂系將領胡宗鐸等不僅明確表示，其處理湘事沒有抵觸政治分會的條例，同時拒絕執行國民政府要求退回原防地的命令；3月8日，李宗仁又發表〈齊電〉請辭國民政府委員、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等職。李宗仁此一辭職通電，猶如給當時的中國政局投下了一顆震撼彈，而南京方面仍試圖做最後的努力；第二天，蔡元培立即到上海訪李，希望李氏偕同李濟深到南京共商解決之道。³⁵同時，蔣介石亦致電李氏期盼「共負艱鉅，俾得轉危爲安，以奠黨國之基」，並望李氏「即日來京，以安大局」。³⁶事實上，蔡元培等人於調查湘變事件的過程中，似曾向李宗仁提出四項條件，做爲解決方案，即：一、取消武漢政治分會；二、提前取消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三、各軍退回原防，魯滌平回湖南；四、改組鄂、湘兩省政府。³⁷李宗仁拒絕後兩項方案，使南京中央與桂系終難避免一戰。³⁸關於上述「條件說」，蔣介石曾於國民黨三全大會上公開予以否認；可能是國民黨三全大會召開時，南京中央政治方式解決的嘗試已受挫，爲堅定討桂決心，乃否認「條件說」。不論南京中央是否曾以條件來解決湘變，其最終結果皆已無法避免讓桂系與南京決裂；蔣介石、蔡元培等最後和平解決湘變的努力，亦未見成效，李氏依然拒絕入京，此一事件後，桂系與南京始終兵戎

³⁴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6卷第10期（民國18年3月8日至3月14日），總頁1821。

³⁵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6卷第10期（民國18年3月8日至3月14日），總頁1821。

³⁶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9日。

³⁷ 「賈景德等致閻錫山支電」（民國18年3月5日），〈兩湖事變案〉，《閻檔》，檔號：0372.42/1037.2-1-2，微捲第4捲。

³⁸ 王文裕：〈北伐前後的桂系與國民政府〉，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1年6月，頁170-171。

相向。

3月1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即通過處置武漢政治分會的辦法，認為：

該分會此次舉動，誠屬不合，應由該分會主席負責。但主席李宗仁因公留京，未及臨時制止，曾自請處分在案。且李事前並未與聞，所請處分，自可無庸置議。不過，該分會決議此案時，預議者為張知本、胡宗鐸、張華輔三委員，該三員應予免職，交由中央監察委員議處。³⁹

這樣的處置辦法，僅是「官樣文章」，⁴⁰根本不能解決問題。蔣介石和平解決的嘗試終告失敗，兩湖事變已無法善了，北伐完成後的首次內戰即將開啓。

叁、孤立桂系的布署

兩湖事變發生之初，蔣介石雖致力於和平解決的嘗試，同時也進行著備戰的部署；2月26日，蔣氏即電告劉峙、顧祝同、朱紹良、蔣鼎文、方鼎英、曹萬順、夏斗寅等師，需在3月3日以前完成軍事動員，其要項如下：(1)以旅為單位，即日集結兵力，停止剿匪任務；(2)各部隊之輸送隊應募齊，其不足使用者，准照新編制酌量擴充；(3)武器被服應速整理補充；(4)各部隊之通信隊應速整理補充；(5)各官佐私人事件及部隊與地方未了之事，需於電到三日內料理清楚；(6)自3月5日起，各部隊須有令到隨時能開始輸送之準備；(7)電到即派員攜帶該師現有武器彈藥表來京領子彈、地圖及通信器材；(8)準備完畢，各隊尚未施行實彈射擊者，應速補行；(9)將準備情形電告為要。⁴¹此一電文猶如蔣氏的軍事動員令，尤

³⁹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6卷第10期（民國18年3月8日至3月14日），總頁1823-1824。

⁴⁰ 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上冊，頁137。

⁴¹ 「事略稿本」，民國18年2月26日。

其這九項要點等同是作戰準備；不過，蔣介石雖下令進行軍事動員，並不代表其態度就傾向主戰，此乃蔣氏「有備無患」的行事風格。

2月27日，國民政府派蔡元培、李濟深、李宗仁和何應欽四人查明真相；同一天，蔣氏再電告在南昌的王均，各部隊亟宜集中，以防不測。⁴²蔡元培等人調查期間，蔣氏對於軍事上的布署毫不鬆懈，2月28日，致電徐州劉峙云：「湘事嚴重，漢方積極備戰，中央昨已決議查辦，結果尚未知，應有實力準備，請積極進行。貴師集中地點由臨淮下車，經合肥至潛山一帶，以第一、第二、第九各師編為一軍由兄指揮，先頭部隊出發約在魚日（6日），恐他方在徐有偵探，請極秘密，並密告墨三（顧祝同）、銘三（蔣鼎文）為盼。」⁴³並於3月2日制定第一集團軍戰鬥序列，由蔣介石任總司令，何應欽任總參謀長，朱培德為前敵總指揮；翌日，又電飭各師向皖、贛及贛鄂邊境集中。⁴⁴此外，蔣氏密電各師積極備戰，同時電諭南昌的王均，隨時注意兩湖情形；電令金漢鼎派專人詳探湘、粵消息，並須與郴州范筱泉（石生）切實聯絡。⁴⁵除了注意南方軍事布署外，並派遣何成濬北上向方振武、范熙績等師說明一切，以穩住北方局勢。⁴⁶

3月1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處置武漢政治分會的辦法，兩湖事變似無善了希望；14日，蔣介石乃立即電請朱培德，轉飭第三軍各師長積極進行戰略布署，他說：「逆軍外假乞憐求和之名，而內實日夕

⁴² 「事略稿本」，民國18年2月27日。

⁴³ 「蔣中正致劉峙儉已電」（民國18年2月28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6，《蔣檔》；「事略稿本」，民國18年2月28日。

⁴⁴ 其餘戰鬥序列如下：劉峙為第一軍軍長兼第一師師長，以第二師師長顧祝同、第九師師長蔣鼎文屬之；朱紹良為第二軍軍長兼第八師師長，以第十三師師長夏斗寅、獨立第一旅旅長陳耀漢屬之；朱培德為第三軍軍長，以第四師師長繆培南、第七師師長王均、第十一師師長曹萬順、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第十八師師長魯滌平屬之；總司令部直屬部隊，騎兵第二師師長張礪生，總預備隊為第六師師長方策、第十師師長方鼎英、第四十八師師長徐源泉、砲兵團團長姚永安。載「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2日。

⁴⁵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2、3、5日。

⁴⁶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4日。

備戰，據來歸軍官稱，逆軍將輕視我軍，謂不堪一擊。希飭所部積極進行，務於卅日（20）準備完畢。」⁴⁷

蔣介石選擇在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電飭南北將領積極部署，除了保障三全大會可以如期召開外，並有南京中央不惜以武力進行討伐的積極宣示作用。翌日（3月16日），胡宗鐸、陶鈞等桂系五將領致了一封〈銑電〉給國民黨中央委員胡漢民、李濟深等人云：「自任公（李濟深）抵京，中央決議以後湘事已告結束。而下游曹、繆、方等師向瑞昌、修水進逼鄂南；夏、朱、劉、顧、蔣等師，分出宿松太湖、英山、霍山進逼鄂東。偵察近日下游各師行動，或無和平誠意。想係前方將領自由行動，竄鄂境界，職部是否迎頭痛擊，以保中央威信之處。祈迅即電示祇尊。」⁴⁸胡宗鐸、陶鈞等人的〈銑電〉，措辭狂妄，目無中央，蔣氏乃於3月19日覆電斥責云：

頃閱兄等銑日致展堂、任潮諸先生電，至深駭異。中央處置力持寬大，但葉琪等部自由行動，襲擊湘省軍隊於前，復違抗中央制止雙方各守原防之命令於後，追擊譚師，迄未停止，中央又豈能不預防其藉口魯師侵入贛境，所有調集皖贛境內各師，在中央之用意全為鞏固中央，防止反動，絕非秘密行爲。中正屢向德鄰、任潮諸兄言之，當可予國人以共見。最近數日，葉琪等部又猛攻譚師，襲擊常德。兄等不知自責，反指中央正式調遣之軍隊爲無和平之誠意。此殆兄等已決心構衅，乃爲此反噬之言。逆料兄等發電之日即密令動員之時，日內必實行向中央各師襲擊，猶冀以迎頭痛擊之詞。誣指中央爲戎首，殊不知適以暴露兄等目中無中央，蓄心作亂之陰謀。……湘事發生以後，痛自愧責，忝爲長官，乃使將士有自相殘殺，同室操戈之舉；坐令兄弟鬩牆，自

⁴⁷ 「蔣中正致朱培德轉第三軍各師長刪電」（民國18年3月15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17，《蔣檔》；「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14日。

⁴⁸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19日。

戕手足，以貽笑外人。其為恥辱，已無倫比，若再不能制止，而必塗炭生靈，豈僅勝之不武，捫心亦何能安？⁴⁹

觀察此一電文內容，蔣似乎已有武力解決湘變的計畫。

除了戰略部署外，拉攏其他地方實力派軍人，也是孤立桂系的重要關鍵。蔣介石由奉化返京後，認為馮玉祥的態度最為關鍵，因為此時馮氏第二集團軍控制著湖北省，以及平漢、津浦兩大鐵路幹線。是以，蔣氏不但隨時與馮保持聯繫，並積極尋求馮的支持；25日，出席國府紀念週後，立即致電馮玉祥云：

弟本日返京，清恙想以就痊，至深馳系（繫）。魯滌平已退入江西，弟在滬晤德鄰兄，允負責制止武漢行動。惟武漢對魯雖以剿共不力、把持財政為辭，但是非自在人心，輿論均致責難。按照政治分會條例，不容直接改組省政府，任免省政府主席及委員。此事就應如何處置，務望迅賜指示。⁵⁰

蔣介石此電雖為詢問馮玉祥處置兩湖事變之意見，實則爭取馮氏支持南京中央。在各軍事領袖中，馮玉祥與南京國府關係較為密切，但其對北伐後中央處理接收平津、收編直魯殘部、對奉問題，已感到極為不滿；而他對於國軍編遣的主張，又不為大會所支持。因此，編遣會議結束後，馮氏即稱病離開南京，返回河南根據地。⁵¹兩湖事變發生時，馮玉祥對於蔣氏的處理態度，亦有所不滿，曾於2月23日的《日記》上云：「目下政府當務之急，只求得民心可耳，徒亟亟以消滅異己是務。吾恐方滅一秦，又生一仇也。……惜介石之逼人太甚，不留餘地，以至弄成現在之僵局也。」⁵²26日，馮氏再於《日記》上對蔣的施政大肆批評，他說：

⁴⁹ 「蔣中正致胡宗鐸並轉夏威陶鈞各師長皓電」（民國18年3月19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26，《蔣檔》；國聞週報社輯：《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6卷第11期（民國18年3月15日至3月21日），總頁1831-1832。

⁵⁰ 「事略稿本」，民國18年2月25日。

⁵¹ 劉維開：《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頁149-151。

⁵²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第2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頁578。

一、三全大會代表，多由圈定指派，較之曹錕賄選，尚糟一著。二、年來日望統一，所以忍所難免，現在將黨及主義離開，而為一己一系爭權，國家分裂之象，又經形成，同室之戈，一操再操，黃臺之瓜，三摘四摘，瞻念國家前途，殊為傷心。三、吾屢代請北伐受傷官兵恤金，當局者輒漠然置之，一錢不名。而北伐後新收各部，卻按月三十萬、二十萬關餉，未免有失不平也。⁵³

北伐完成後蔣介石的種種措施，引發馮氏的不滿，成為蔣氏拉攏第二集團軍必須突破的困境。針對馮所提及關餉不公一事，蔣乃力謀補救，給予馮較閻錫山第三集團軍多的軍餉。⁵⁴同時派遣邵力子、馬福祥常駐河南省輝縣百泉馮玉祥軍中，以進行遊說工作。⁵⁵此外，蔣氏曾多次致電馮玉祥，強調彼此共患難才能力挽危局，3月4日蔣連續給馮兩封電文就提到：「時局混沌，革命已至險境，若復隱忍遷就，必誤黨國。弟已準備犧牲，凡能共患難到底，益感大誼。」⁵⁶蔣氏多管齊下的努力，終於發揮了效果，3月11日，馮氏致電表明「服從中央之態度」。⁵⁷蔣氏透過多種途徑的積極努力下，終於把馮玉祥拉到同一陣線，獲得馮氏的表態支持後，蔣對於解決兩湖事變更具信心。因此，當胡宗鐸、陶鈞等桂系將領發表〈銑電〉後，蔣立即電告馮氏云：處置湘變雖經三全大會制止，仍未收效；為維持中央威信計，惟有武力制裁，以我二人通力合作，必能排除萬

⁵³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581。

⁵⁴ 曾業英：〈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2期（2000年3月），頁18。

⁵⁵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11日；劉紹唐編：《民國大事日誌》，第1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7年5月），頁423。根據馮玉祥《日記》記載，當時南京派邵力子赴百泉曾以保薦行政院長及兩湖主席為條件，來遊說馮氏。參閱馮玉祥：《馮玉祥日記》，第2冊，頁603。

⁵⁶ 「蔣中正致馮玉祥支亥電」（民國18年3月4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12、13，《蔣檔》。

⁵⁷ 曾業英認為蔣中正在拉攏馮玉祥的過程中充滿挫折，直到3月28日馮氏才表示擁蔣。事實上，3月11日蔣即接獲馮氏表示擁護中央的電文，3月28日是馮表示願意出兵擁蔣討桂。參閱曾業英：〈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2期（2000年3月），頁18；「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11日。

難。⁵⁸中央在發布討伐令前夕（3月25日），蔣還是致電馮氏云：「時局日急，患難日長，吾人惟有共負艱鉅，平此禍亂，以固黨國。」並請馮氏駐鄭主持一切。⁵⁹

除了馮玉祥外，閻錫山、張學良也是蔣介石拉攏的對象。兩湖事變爆發，蔣氏從奉化返京後，於第一時間立即電請閻錫山來京面商一切，其積極示好之意，不言可喻。⁶⁰蔣亦於3月14日電請閻錫山協助監視白崇禧的行蹤，同時要求閻氏下令凡經過石家莊、保定、天津等地的車輛，均應徹底檢查，以免有所疏漏。⁶¹29日，蔣氏親往九江督師，臨行前致閻錫山〈豔電〉，敦請閻氏負責北方大局。⁶²在在說明蔣籠絡閻氏之意。

此外，蔣介石也請何成濬轉請張學良嚴密監視在唐山的白崇禧部隊，不准其移動，一有移動，立即以武力解決。⁶³3月17日，方本仁自瀋陽來電表示：張學良對白崇禧並無好感，且有擁護中央之意。⁶⁴兩天後（3月19日），方本仁自東北返回南京，張學良曾請其轉交一封親筆信函給蔣介石，蔣氏收到張的來函後覆電表示：「拜讀手書，肺腑之語，無任感銘。國有義士，人有忠友，革命必成，每於百忙之中，讀兄之書，此心

⁵⁸ 「蔣中正致馮玉祥養電」（民國18年3月22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27，《蔣檔》。

⁵⁹ 「蔣中正致馮玉祥有電」（民國18年3月25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40，《蔣檔》；「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25日。

⁶⁰ 「事略稿本」，民國18年2月25日。

⁶¹ 「蔣中正致何成濬寒電」（民國18年3月14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16，《蔣檔》；「蔣中正致何成濬銑電」（民國18年3月16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19，《蔣檔》；「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14、17日。

⁶² 「蔣中正致閻錫山豔電」（民國18年3月29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63，《蔣檔》。

⁶³ 「蔣中正致何成濬寒電」（民國18年3月14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16，《蔣檔》；「蔣中正致何成濬銑電」（民國18年3月16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19，《蔣檔》；「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14、17日。

⁶⁴ 「方本仁致蔣中正篠電」（民國18年3月17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23，《蔣檔》。

乃得大慰。」⁶⁵3月23日，張學良致電蔣介石，對於其處理兩湖事變「公正無私」、「恩威並濟」，深感「欽佩不已」。⁶⁶透過這些文電，把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等與南京中央緊密結合，桂系則已漸漸被孤立。

爭取桂系內部軍人倒戈，則是蔣介石孤立桂系的另一途徑。白崇禧在北方的軍隊，主要來自唐生智部，據周震麟來電表示：自唐部歸白，湘桂歧視，湘籍將士既憂飢困，又恐從白陷於不義，處境甚艱。⁶⁷於是蔣乃重新啓用唐生智，唐氏乃於3月20日由天津赴唐山接收舊部，李品仙等遂於是日發表〈號電〉聲討白崇禧，該電云：「白崇禧自接領本軍以來，排除異己，尅扣軍餉，野心素熾，物欲沒煞本心，歷年爲革命奮鬥之歷史，而作彼個人爭權攘利之工具。近更明目張膽，強令本軍，擾亂北方，響應武漢，襲攻徐海，進擊首都，元惡大□，人得而誅。品仙等追隨革命，歷有年所……爲國家正綱紀，爲袍澤留正氣，此心皎然，生死不已。惟知貫徹初衷，服從中央，擁護統一。」⁶⁸此一通電終於迫使白氏隻身遠遁日本、香港。⁶⁹

此外，蔣也對桂系基層軍人進行拉攏，3月16日曹萬順致蔣介石電稱：桂系軍人李明瑞代表劉福華來稱：胡宗鐸異常跋扈，各方不平，不甘附逆，願相機率部來歸。蔣氏獲得此一消息，立即要曹萬順儘速與李明瑞代表聯繫接洽，並囑其能派親信來京面商。⁷⁰蔣氏乃與桂系李明瑞、楊騰

⁶⁵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19日。

⁶⁶ 「張學良致蔣中正漾電」（民國18年3月23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31，《蔣檔》。

⁶⁷ 「周震麟致蔣中正文電」（民國18年3月4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14，《蔣檔》。

⁶⁸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6卷第11期（民國18年3月15日至3月21日），總頁1832-1833。

⁶⁹ 「方本仁致蔣中正電」（民國18年3月25日），「陳銘樞致蔣中正電」（民國18年3月30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46、66，《蔣檔》。

⁷⁰ 「曹萬順致蔣中正電」（民國18年3月16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20，《蔣檔》。

輝取得聯繫，彼此合作，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胡宗鐸等已陷於完全孤立狀態。

兩湖事變初起，蔣介石即與桂系軍人斡旋，試圖以政治方式解決，並積極聯絡其他地方實力軍人，爭取支持，同時進行軍事部署，以備不時之需。當雙方歧見日深，而漸行漸遠之際，則蔣的軍事部署已完成，亦已斷絕其他地方實力派軍人對桂系的奧援，故能進行武力討伐。3月26日，國民政府下令將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等免職查辦，並開除三人黨籍，南京中央的討桂戰爭於3月底正式展開。

肆、武力討伐的行動

1928年12月1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講〈北伐成功後最緊要的工作〉時，即特別指出：我們中國內部，尤其是本黨黨員個個要能夠明瞭主義，共同一致來擁護中央，服從中央的命令；個個武裝同志能犧牲個人的地位權力，奉還中央，完全由中央來統一財政、軍政。⁷¹不過，北伐後的局勢並不如蔣氏所期盼，對於北伐完成後的政治情勢，蔣於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致詞時曾有所描述：

北伐完成以後，形式上中國已經統一在民國之下，而地方軍事領袖也沒有人不以服從中央相號召了。但是事實卻完全相反，地方把持財政，購買軍械，私增兵額，都聽地方為所欲為，中央絲毫不能加以干涉。而且不僅地方的行動，中央不能干涉，甚至地方常以軍事的實力威脅中央，要挾中央。……黨內一部份同志，常常攻擊中央當局，以為政府沒有為民眾圖謀利益。這雖然不能說他們是出於惡意，至少也是昧於事實。事實上阻擾民眾利益的障礙還沒有剷除，民眾的利益那裡能夠實現。而阻擾民眾利

⁷¹ 蔣中正：〈北伐成功後最緊要的工作〉，載黨史會編：《革命文獻第21輯—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史料》〈臺北：編者，民國57年9月，影印版〉，合訂本，總頁4128。

益的障礙，便是地方各自為政，不能真正服從中央，完成統一。⁷²

有鑒於此，蔣介石非常重視國家的真正統一，爲了效法清朝康熙皇帝平定三藩的經驗，蔣氏在這段期間最常閱讀的書籍就是《聖武記》、《清代通史》等書。⁷³1929年3月21日蔣氏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發表演說，即針對兩湖事變提出強烈抨擊，他說：「地方軍人，目無中央，驕恣成習，積漸而有此種重大違法之舉，公然違背中央之決議破壞國家統一之威信，此風一開，則各地軍事領袖，均可隨一己之喜怒，任意輕啓戰端，憑一己之好惡，擅自任免高級政治人員。此種行爲，相習成風，則中央威信墮地，地方割據形成，全國更無統一之望。」⁷⁴是以，蔣氏以完成國家統一爲最高目標，在和平解決嘗試失敗後，即斷然決定訴諸於武力討伐。

3月21日，蔣介石以李濟深謀叛甚明，由吳敬恆陪同李氏幽禁於湯山，國民政府亦於同日令葉琪免職查辦，夏威免職，所部由旅長李明瑞升充師長，移往廣西訓練。⁷⁵26日，南京中央正式頒布討伐令，免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本兼各職聽候查辦。同時任命朱培德爲討逆軍第一路總指揮兼第三軍軍長，劉峙爲討逆軍第二路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韓復榘爲討逆軍第三路總指揮，陳調元爲討逆軍總預備隊總指揮。⁷⁶由第二路擔任主攻，蔣氏要求劉峙需於28日進佔武穴，即刻進佔羅田與蘄州之線，再與馮玉祥部隊於4月6日會師武漢，進行總攻擊。⁷⁷

⁷²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15日。

⁷³ 蔣介石於1928年底至1929年初，最常閱讀的書籍就是《聖武記》、《清代通史》等書，他曾說：「前清對於藩鎮與封建制，似較歷朝為勝。觀於此（《聖武記》）可知立國之難與駕馭之難，足為鑑戒！」參閱王宇高等編：《蔣總統學記》（民國17年11月10、16日、18年1月15日、19年12月12日），〈文物圖書〉，《蔣檔》。

⁷⁴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21日。

⁷⁵ 陳存恭：〈李、馮、閻等亂事之平定〉，總頁1534-1535。

⁷⁶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21、26日；「國民政府頒佈討伐令」（民國18年3月26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47，《蔣檔》。

⁷⁷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24、25日；「蔣中正致劉峙朱紹良敬酉電」（民國18年3月24日）、「蔣中正致劉峙有電」（民國18年3月25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37、38，《蔣檔》。

蔣介石爲了削弱桂系軍力，俾使軍事討伐得以順利進行，乃積極拉攏何鍵擁護中央。3月21日，蔣即派王大楨入湘與何鍵接洽；26日，國民政府任命何氏爲湖南省主席，蔣氏親自電勸何鍵「當機立斷，毅然就職，明白反桂」，「三湘人民之禍福亦決於此」。⁷⁸蔣氏原本並不預期何鍵能確實加入反桂的行列，只盼望其至少不積極助桂即可，不料何氏於國府命令到達之日，即刻宣布就職，擁護中央。⁷⁹何鍵支持南京，讓中央討逆軍無後顧之憂，軍事進展更爲順利。

此時桂系似有死守武漢之準備，以待兩廣進兵支援，再取攻勢。⁸⁰基於此，蔣氏乃積極策動粵方將領陳濟棠、陳銘樞等支持中央討逆，使廣東部隊能不爲桂系所利用。粵方八路軍參謀長鄧世增曾通電要求釋放李濟深，支持桂系；爲此陳銘樞去電痛斥鄧氏，並向蔣氏表示：「粵必無異動，職力能保持粵局，請稍寬念。」⁸¹因此，當朱培德擔心兩廣出兵將影響兩湖戰局時，蔣氏很有信心地電告朱氏：「廣東內部不一，除在粵之桂軍約六團兵力，決不能多出一兵。」⁸²3月30日，陳濟棠、陳銘樞、蔣光鼐、陳策等粵方將領就發表聯合通電云：「粵省軍隊爲黨國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揮驅策。粵省之財，皆粵人賣兒貼婦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擲犧牲。」⁸³此一通電，使得桂系在粵的勢力遭到嚴重打擊，李宗仁乃倉皇離穗赴桂，而桂系在武漢的局勢亦岌岌可危。在如此有利的條件

⁷⁸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26日；「蔣中正致何鍵感未電」（民國18年3月27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53，《蔣檔》。

⁷⁹ 「蔣中正致朱培德宵電」（民國18年3月26日）、「王大楨致蔣中正微電」（民國18年4月5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49、101，《蔣檔》。

⁸⁰ 「蔣中正致朱培德劉峙朱紹良漾電」（民國18年3月23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28，《蔣檔》。

⁸¹ 「陳銘樞致蔣中正有電」（民國18年3月25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44，《蔣檔》。

⁸² 蔣介石於朱培德來電上的批示，參閱「朱培德致蔣中正儉電」（民國18年3月28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62，《蔣檔》。

⁸³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6卷第13期（民國18年3月29日至4月4日），總頁1842。

下，中央討逆軍進展得非常順利。

同時，爲了激勵中央軍的討逆行動，蔣氏曾電告朱培德、劉峙云：「第二路如能如期佔領漢口與漢陽，當犒賞現洋二十萬元，首功者另有特賞。」⁸⁴是以，中央討逆軍於4月1日即佔領黃崗、麻城，桂軍主力夏威部移往江北，而設於前線左翼的李明瑞、楊騰輝等第七軍官兵，又於4月3日在孝感通電支持中央，率部向武漢進逼。另一方面，海軍在司令陳紹寬率領下，控制長江沿岸，對桂系亦發揮箝制的作用。

鑒於情勢不利，胡宗鐸、陶鈞、夏威等人無心戀戰，乃率隊急退荊、宜，原本胡宗鐸等桂鄂軍有意進入四川，以保存實力。不過，蔣介石已先預知桂系的圖謀，早就電請川軍劉湘部進佔宜、沙，以斷桂軍西退之後路。⁸⁵4月5日，中央討逆軍即兵不血刃地攻佔武漢，蔣介石對於李明瑞、楊耀輝等陣前反正，使戰情得以急轉直下，深表嘉許，特致電李、楊云：「此次李、白抗命作亂，兄等竟能深明大義，服從中央，其革命精神與歷史，將與黨國同休，中亦與有榮也。茲中央已頒犒賞費十萬元，請代慰勞各將士，並先發伙食洋廿萬元，其餘皆照所囑辦理。」⁸⁶至於此次戰事順利的最大關鍵，蔣氏認爲在於粵省陳銘樞、陳濟棠的響應，他說：「此次討伐武漢，各方響應以粵省關係爲最大，陳銘樞、陳濟棠軍能忠實瞭解，使西征之軍一槍不發，僅由海軍略事砲擊，即告收平，是主義戰勝之效也。」⁸⁷雖云是「主義戰勝之效」，實則蔣氏謀略運用成功所致。

中央討逆軍克服武漢之後，4月6日蔣介石在海軍的陪同下抵達武漢，各地方實力派軍人則紛紛致電表示擁戴；⁸⁸此時退據鄂西的湘桂軍，尚有胡宗鐸、陶鈞、程汝懷三師，蔣氏乃於10日重下追擊命令，冀以迅

⁸⁴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28日。

⁸⁵ 蔣介石於劉湘來電上的批示，參閱「何成濬轉劉湘致蔣中正世電」（民國18年3月31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71，《蔣檔》。

⁸⁶ 「蔣中正致李明瑞楊耀輝微申電」（民國18年4月5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97，《蔣檔》。

⁸⁷ 「事略稿本」，民國18年3月28日。

⁸⁸ 馮玉祥、張學良的電文可參閱「馮玉祥致蔣中正魚電」（民國18年4月6日）、「馮

速肅清殘敵。南京中央以張發奎為第一路追擊司令官，方鼎英為副司令官，率領第四、第十兩師，由武漢嘉魚乘船向上游追擊；朱紹良為第二路追擊隊司令官，夏斗寅為副司令官，率領第八、第十三兩師及獨立第一旅，向荊門、沙市方面追擊敵軍；海軍派淺水兵艦向沙市追擊敵軍；航空大隊由武漢航空站向荊、沙地區飛翔，以妨礙敵軍之行動。⁸⁹在陸海空強大火力壓迫下，胡宗鐸、陶鈞、夏威等致電蔣氏表示願離隊出洋，軍隊聽命中央收編。4月17日，蔣致電胡、陶、夏保證其安全，並望早日出洋；翌日（4月18日）蔣氏再致電胡、陶、夏，表示中央願意發洋十萬元作為彼等出洋川資。⁹⁰21日，胡、陶、夏通電離軍出國，所部將領亦通電服從中央改編，兩湖戰事終告結束。⁹¹

1929年至4月底，兩湖戰事即告一段落，李宗仁等人退回廣西根據地，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三人重行在梧州聚首，回顧這兩、三年來，由參加北伐到敗退回桂，彼此均百感交集。⁹²5月5日，李宗仁等在梧州，重新舉起「護黨救國軍」的名號，李氏自任護黨救國軍南路總司令，發出討蔣檄文；⁹³同時出兵廣東，企圖以東進的勝利來扭轉政局。蔣氏乃急電陳銘樞、俞作柏、李明瑞等迎敵，並令閩南張貞部速佔潮、汕，配合粵

玉祥致蔣中正陽電」（民國18年4月7日）、「張學良致蔣中正庚電」（民國18年4月8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109、113、120，《蔣檔》。

⁸⁹ 「事略稿本」，民國18年4月21日。

⁹⁰ 「蔣中正致胡宗鐸陶鈞夏威蓀電」（民國18年4月17日）、「蔣中正致胡宗鐸陶鈞夏威巧電」（民國18年4月18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編號134、139，《蔣檔》。

⁹¹ 「事略稿本」，民國18年4月10日。

⁹²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402。

⁹³ 李宗仁的討蔣檄文中，曾斥責蔣氏云：「非法私造三全大會，置中央委員、黨中先覺及各省、各級黨部之反對於不顧，毀黨亂紀，植其帝制自為之基。解決濟案私定秘密條件，居心賣國，復自請延期，撤兵求援外力，圖使內爭，塗炭生靈，動兵邦，任用外戚，賄賂公行，凌亂度支，飽盈私壑，排除異己，殘害同胞，此賊不除，黨國何有？」載《護黨週刊》，第411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申曉雲、李靜之：《李宗仁的一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頁156。

軍攻桂，⁹⁴結果進攻廣東的桂系軍隊相繼潰敗。此外，蔣又電令何鍵於佔領桂林後，主力轉向賀縣、梧州以殲滅桂軍。⁹⁵6月2日，湘、粵軍攻佔梧州，李、黃、白相繼逃往香港；7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俞作柏為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為廣西編遣區特派員。7月7日，俞作柏在南寧就任桂省主席，南京中央的討桂戰爭宣告結束。

伍、結 論

兩湖事變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全國後，首次地方軍人的異動，對南京中央的統治威信影響至鉅，該如何妥善解決來自地方的挑戰與紛爭，則考驗著中央領導人的智慧。身為全國最高領導人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於兩湖事變發生時即強調以政治手段解決，不輕啓戰端，雖然南京方面有人主張武力討伐，但蔣氏仍秉持「先政治後軍事」的處理原則。

蔣介石透過公與私兩種途徑嘗試和平解決此次爭端，在私的方面，蔣氏從奉化兼程返京途中，立即親往上海與李宗仁會商解決辦法，再隨時保持與李宗仁、白崇禧等文電往返，冀望藉由桂系兩大要員的約束，使兩湖事變得以平和落幕。在公的方面，由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成立四人小組進行調查，成員包括李濟深和李宗仁兩名桂系領袖，即希望該調查能讓雙方滿意，並昭公信。但中央與地方互信基礎薄弱，使得蔣氏和平解決的嘗試終告失敗，此次爭端仍然釀成軍事衝突。

兩湖事變發生之初，蔣介石雖致力於和平解決的嘗試，同時也進行

⁹⁴ 「蔣中正電張貞遠佔潮汕派部至興寧防堵蔣光鼐在七女湖激戰潰敵」（民國19年5月19日）、「蔣中正電陳銘樞俞作柏李明瑞師由滬出發令其在廈門候訊」（民國18年5月19日）、「蔣中正電李明瑞粵省逆軍伍勵部死傷重請直航虎門」（民國18年5月20日），〈蔣總統籌筆一統一時期〉，第5冊，總編號1630、1631、1635，《蔣檔》。

⁹⁵ 「蔣中正電何鍵佔領桂林平樂後應向梧州賀縣截擊逆軍在清遠被俘」（民國18年5月20日）、「蔣中正電何鍵粵省報捷逆敵潰散我主力應轉向賀縣梧州以期殲滅逆軍」（民國18年5月22日），〈蔣總統籌筆一統一時期〉，第5冊，總編號1637、1650，《蔣檔》。

著備戰的部署，以蔣氏對地方軍人的瞭解，「有備無患」有時反而可以止戰。蔣氏戰略部署以孤立桂系為原則，分別透過幾種途徑來達成此一目標。首先，蔣氏動員各部隊完成備戰準備，其具有「用兵止叛」的宣示作用。其次，拉攏其他地方實力派軍人，這期間以馮玉祥、閻錫山和張學良的態度最為關鍵，蔣氏透過各種途徑的努力，希望將馮、閻、張三人與南京中央緊密結合，當馮、閻、張三人紛電表示擁護中央時，似已註定桂系即將失敗。最後，蔣氏策動桂系內部軍人來歸，李明瑞、楊騰輝陣前反正是最典型的例子；而聯繫粵軍將領陳銘樞、陳濟棠，以箝制廣東軍隊不為桂系利用，則發揮最大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蔣氏「和平解決的嘗試」與「孤立桂系的布署」幾乎同時進行，可以視為是蔣氏的「兩手策略」，更可以說是一種「相輔相成」的策略運用，也就是說蔣積極於進行孤立桂系的戰略布署，目的是為了能夠達成和平解決爭端。

「國家統一」，一直是蔣介石的最高目標，因此當以和平方式解決紛爭不可得時，蔣氏為求國家統一，會不惜訴諸於武力的方式。兩湖事變在和平解決嘗試失敗後，蔣即斷然決定武力討伐；此時「孤立桂系的布署」，又成為武力討伐得以成功的最佳保證，蔣氏的戰略運用得當，終於獲得討桂戰事的勝利。不過，訴諸武力的方式來達成國家統一，不僅耗損國力，更常常召致外患入侵，使中國的領土和主權迭遭列強的欺凌與攫奪。因此，歷經1929年一整年內戰的蔣氏，於1930年初也曾一度希望實施聯邦制來解決爭端，應可視為蔣氏對於武力討伐方式來達成國家統一的自我反省。⁹⁶

⁹⁶ 1930年3月20日上午8時，蔣中正由南京湯山搭車經句容前往鎮江，蔣云：「途中見太陽圓明，精神為之爽暢。因之聯想及地球與各行星皆為球形，凡天然物體，其原始皆為球形，球形圓故不能平，而只可以均；又以其圓故動則循環不變。乃為之斷曰：『事物可均而不可平，惟循環而能不變。古之所謂平天下，與今之所謂國際平等者，豈不難哉？』」當天晚上，蔣氏搭船由鎮江前往上海，漁船中云：「事物既不能得其平，則國事政治如欲求其速，或先聯邦而能統一乎？」參閱王宇高等編：《游記》（民國19年3月20日），〈文物圖書〉，《蔣檔》。

徵引書目

(一) 檔案、史料彙編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冊，「湘鄂事變」。

〈蔣總統籌筆—統一時期〉，第5冊。

王宇高等編，《游記》，〈文物圖書〉，民國18年、19年。

王宇高等編，《蔣總統學記》，〈文物圖書〉，民國17年、18年、19年。

袁惠常編，《民國18年之蔣介石先生》，「事略稿本」，民國18年，〈文物圖書〉。

《閻錫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0372.42/1037.2-1-2，〈兩湖事變案〉。

18.0372.42/0032-3，〈雜派民國18年3月往來電文錄存〉。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未對外刊行，民國67年10月。

許師慎編，《國民政府建制職名錄》。臺北：國史館，民國73年1月。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臺北：出版者不詳，民國41年。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21輯—關於國軍編遣史料。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57年9月。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24輯—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史料。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57年9月。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輯。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詳。

(二) 工具書

張憲文等主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8月。

劉紹唐編，《民國大事日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7年5月。

(三)文集、日記、回憶錄

白崇禧口述，賈廷詩等訪問記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5月。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

黃紹竑，《五十年回憶》。張玉法、張瑞德主編，《中國現代自傳叢書》。臺北：龍文出版社，民國78年6月。

(四)專書

申曉雲、李靜之，《李宗仁的一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

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臺北：東華書局，民國77年9月。

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詳。

劉維開，《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8年3月。

Lary, Daina,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Sheridan, James E.,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五)期刊、論文

王文裕，〈北伐前後的桂系與國民政府〉，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民國81年6月。

陳存恭，〈李、馮、閻等亂事之平定〉，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3篇，「統一與建設」（3）。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78年1月。

曾業英，〈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近代史研究》，2000年2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3月）。